

◀（上接 11 版）

一如其以往的研究,戴维斯的写作从手抄本、古籍和档案入手,选择了一个生动而神秘的普通人物,将微观、具体的个案研究置于 16 世纪初地中海世界的宏大历史叙事之中。其笔下的瓦桑或利奥,形象并不固定,跟他自述中的两栖鸟一样,因时因地变换着身份。为了说明这种身份和立场的转换,戴维斯在行文中刻意地根据不同的语境使用他的阿拉伯名字瓦桑或其在意大利时自称的约安拿·阿萨德,这个人物藉此周旋于北非与意大利、伊斯兰教与基督教这两个世界当中。同时,戴维斯借伊斯兰教教义中被称为“塔基亚”的隐昧真实信仰的做法,为瓦桑的身份变换寻找法理上的依据,以此解释其在意大利生活近十年的心路历程。

本书英文原版的标题为“Trickster Travels”,之前在中文学界的有关介绍中通常直译为《骗子游历记》,另在不同的英文版本中还出现过两个不同的副标题——“A Sixteenth-Century Muslim Between Worlds”和“The Search for Leo Africanus”。细细品味其标题,可以体会到主人公的身份变换在整个历史叙事中的重要性,两个副标题中对人物的指称分别反映了从北非伊斯兰教世界和基督教欧洲出发的不同视角,而“身处两个世界之间”则显示出其特殊的人生际遇和内心矛盾,由此引出后世学者们的苦苦“搜寻”。过去被译作“骗子”的“trickster”一词,实际上反映了戴维斯对瓦桑这个人物的理解,在此她借用了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有关“trickster”的人类学概念,列维-斯特劳斯在《神话学》(Mythologiques)中根据北美原住民的神话传说,指出在二元对立的神话思想中,存在着某些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trickster”的角色,他们保留了二元性质中的某些成分,具有模糊的、矛盾的,或模棱两可的甚至“狡诈”的特性,在对立的矛盾之间发挥着中间调和的作用。戴维斯在瓦桑叙述的鸟的故事里,发现了这种性格特征;在伊斯兰-阿拉伯和欧洲的文化传统中,也找到了相似的主题;瓦桑的经历以及教义中“塔基亚”的隐昧原则也证明了其可能具有类似的性质。因此,“trickster”作为一个人类学、神话学的理论概念,也适用于对本书主人公的心理、性格和命运的概括,因而被素来青睐历史人类学研究路径的戴维斯采用作为书名。

然而,在翻译的过程中,“骗子”一词在现代汉语中相对较为明显的负面含义似乎并不能反映戴维斯使用“trickster”时的深

意,简单的直译可能会误导读者对人物的理解。推敲再三,又与作者反复讨论,我们决定以“行者诡道”四字作为中文译本的书名,一方面借用并转换了《孙子兵法》中“兵者,诡道也”的句式,用“诡道”来对应“trickster”词义里的机智、狡诈和计谋等意;另一方面,“行者”一词,既反映了瓦桑旅行家、外交官的身份,又呼应到旅行在伊斯兰教传统中所带有的修行、求知等内涵。

“行者”瓦桑的足迹,遍及当时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格兰纳达、菲斯、突尼斯、阿尔及尔、开罗、麦加、伊斯坦布尔……又远涉撒哈拉沙漠,南下深入到少有人知的黑非洲;更为难得的是,他在机缘巧合之间来到文艺复兴盛期的意大利,与罗马的教会上层和人文主义者皆有往来。凭着这不同寻常的经历和见识,当受洗成为基督徒的约安拿·阿萨德在罗马坐定著述、也成为一名作者的时候,在他为后世留下的文字中,展现了他所经历过的那些丰富多彩、交错盘结的世界及其文化。戴维斯在本书中所做的,便是由这些文本抽丝剥茧般地为 我们展现瓦桑的人生经历和精神世界,试图透过这个微观而具体的历史个案来反思现实世界中的文化差异,乃至矛盾与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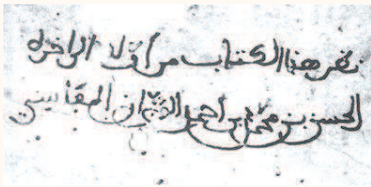
文化与空间

瓦桑的“诡道”,既有其自身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根源,更受到了所处时代的深刻影响。15 世纪末、16 世纪初的地中海世界,处于急剧的动荡之中,政治和宗教的冲突不仅发生在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东方与西方之间,也存在于它们各自的内部,瓦桑独特的人生经历,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将各种文化因素和矛盾冲突交织串联在一起,而他也在不同的时空语境中变换着自己的身份和立场。

作为研究者,必须在这样的过程中调整自己的主体意识,更好地适应历史的语境,“我不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欧洲主义者’,而是一个可以挪移位置的历史学家。而且,当我在欧洲或其他任何地方进行写作时,我总是试图通过世界其他地方人们的眼睛来讲述故事,即便只是一种精神上的神游”。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叙事是随着人物及其语境的变化而转变的,这种特殊的研究视角充分反映了戴维斯晚年的史学认识。2010 年在挪威接受霍尔堡奖时,她用“去中心的历史”这一概念来阐释如何在历史叙事中将宏观的全球视野与微观的地方性知识融汇整



位于罗马的圣天使堡,1518—1519 年,瓦桑曾被监禁于此。教皇利奥十世常在其楼上厅室中举行宴会;1527 年“罗马之劫”期间,教皇克莱芒七世与许多教士在此避难。



1519 年,在受洗前九个月,瓦桑在梵蒂冈图书馆的一部手抄本中的签名:“哈桑·伊本·穆罕默德·伊本·艾哈迈德·瓦桑·法西,从头至尾,已阅此书”。

合在一起,她指出:“去中心的历史学家讲述过去的故事,并不仅仅从世界某一地域或有权势的精英阶层的优势立场出发,而是在社会和地理层面扩大他或她的视野,引入多重的声音。”

她所主张的“去中心”,不仅是所谓“自下而上”或是“从边缘到中心”等在研究领域上的拓展,更是一种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历史不是单线程的、孤立的演进,而是扩展为一种立体的、多重的、交错的往复关系,也就是本书导论部分的主题——“交错盘结”的历史;她不是用某个新的“中心”代替传统的分析体系,而是将分散的、个体的和微观的“地方性知识”置于全球史的视野之下,从而完成去除中心的任务。

具体来说,在戴维斯的笔下,瓦桑的故事成为一个跨越地理空间、跨越不同宗教文化的历史叙事;为了提醒读者注意,戴维斯在行文中往往根据特定的情境使用不同的名字指称瓦桑,在年份的标记上同时使用伊斯兰历法和公元纪年。她在本书中写道:“我尽可能全面地将哈桑·瓦桑置于 16 世纪北部非洲的世界中,那里聚居着柏柏尔人、安达卢西亚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和黑人,而欧洲人正一步步在边境蚕食渗入;尽力阐明他去意大利时所怀有的对外交、学术、宗教、文学和性别的观点;揭示他对基督教欧洲社会的反应——他所学到的、他的兴趣和困扰、他所做的事情、他是如何改变的,尤其是他在欧洲时是如何写作的。我所描绘的肖像是这

样一个人,他具有双重的视野、维系着两个文化世界、时常想象面对两种类型的读者、运用由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中习得的技巧并以其自己特殊的方式融入欧洲的元素。”

在过去的许多研究中,我们一直把戴维斯看作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的领军人物;而在进入 21 世纪后,新文化史热潮渐趋平静,许多参与者纷纷转向反思,或是嗟叹“新文化史正在走向其生命周期的终结”,或是提出要“超越文化转向”,戴维斯的史学实践也没有止步不前,在晚年依旧勤勉治学,结合了现时代的全球化趋势,以“文化交错”的概念整合新文化史和全球史的研究路径,探索出了一条进一步推进历史学“去中心”的路径。根据她所提出的“交错的历史”(braided histories)之说(戴维斯也因此被戏称为“编辫子的历史学家”),有学者评价:“在她的作品中,秩序与僭越、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引人入胜的细节与宏大的图景、同情、学术、想象的世界与现实的关怀,总是交织其间。她喜欢将自己故事里的历史人物以及他们的所思、所想和所言与我们的方式相互推敲、往复。她是一个完美的编织匠,把近代早期欧洲的伟人(和不那么著名的普通人)同无数的朋友、同事、学生和世界各地的读者联系在了一起。”远在中国的读者,即使在时代和文化上距离本书所讲述的主题十分遥远,仍可从中深刻地感受到不同文化之间及文化内部的动态关系,体会到个人在其中的情感、经验和命运。

ave loro incontrano piu presto li membri de li dei
nam che la dea Radia e virano quili e fanno piu
deve la virginita senza dubio in modo che si da creae
re che mi nouella fuje fatta da qualche uicidolo
malitioso che usaua infelzare le dee virgine e me
dea nouella per scusa de non suongognare la vergi
ne ne li soi parenti maxime quelle bestiale gene
rone che sono molto zelose onae ipso compositione
poi non ricordasse piu per la labol sua memoria de
alcune cose gaurate sj de la Europa si erano de li
fructi ne arburi, ne fructo, ne Radia, ne khima
pero dunque gane silenzio al fine di sue Pauland

Finito el libro o non trinito del prelo
in compositione di joan bione granuli
no circa el significato de Affrona
sue Ciprati De font adloni, Habi
tatione; Casa li, fructi, Luma
li se lomo con loma smolme
ti de li fructi e Radia
in cogite per modo de
Cefinoqoginia in Roma
nisi i o in anno 1516

约安拿·阿萨德《非洲地理书》的结尾部分,内容是关于一种撒马克植物的传说,他对其所传闻的助性作用有所怀疑;他在最后说明中自称“以上文字的编者格兰纳达的约安·利奥尼”。

历史与现实

娜塔莉·戴维斯的学术和人生,从来不是封闭在象牙塔里的,现实的关照和历史的反思在她的研究中时时发人深省。

因为犹太人的身份,戴维斯自幼就对少数族裔在北美主流社会中的地位有切身而自觉的感受;在学生时代她便倾心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政治上倾向于左派激进主义的立场,博士论文研究的选题也以底层劳工史为对象、以社会史为路径。她的丈夫钱德勒·戴维斯更出生于一个左派知识分子家庭,父子都是坚定的美共党员;1950 年代,戴维斯夫妇因为政治倾向而受到麦卡锡主义的审查和迫害,两人被当局没收护照、禁止出境,钱德勒更被记入黑名单而失去教职,并一度获刑入狱。1960 年代初,戴维斯夫妇不满于当时美国的政治和学术气氛,一俟钱德勒获释出狱,便选择离开美国、移居加拿大,在多伦多大学继续他们的学术生涯,并以此为终老之地。

1950 年代的极端政治气候,让正值博士论文写作关键时期的娜塔莉被没收了护照,她因此无法再去法国收集资料和阅读档案,研究工作一度陷入困境,也使她对其所关注的 16 世纪法国出版商和印刷业主们有了感同身受的理解,“那些早期新教印刷业主,因为私自出版反

（下转 13 版）▶